

传媒与灾难：中国传媒的海地地震表述

罗安平

[提要] 2010年1月12日，海地大地震，23万人被夺去生命。中国传媒延续和继承汶川地震中锻炼出来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之专业精神，对海地灾难进行及时全面报道。在记录之外，与汶川地震中承担的救赎与动员使命相比，传媒在对异国他乡的灾难进行报道之时，其表述必然带着他者的立场与眼光。本文从国家形象塑造、多元人性呈现以及冷酷世界症候群的防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媒对海地与汶川地震表述的异同，从而思考传媒在呈现、表述灾难之时，如何更好地激发关于灾难的反思，启示走出灾难的道路。

[关键词] 海地地震 传媒 国家形象塑造 多元人性 冷酷世界症候群

2009年5月17日，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称：“如果你曾听说过海地这个国家，通常是因为该国又有令人恐惧的事情发生。这个国家因飓风、森林滥伐、贫穷、毒品走私、暴力、独裁、伏都教和奴隶制而闻名。”^① 谶语不幸被言中，2010年当地时间1月12日，一场当地200年来罕见的7.3级大地震突袭这个“噩梦般的共和国”，把全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

在传媒时代里，灾难事件即意味着“媒介事件”。回顾汶川大地震的中国媒体，毋庸置疑，那次“集中在‘救赎’主题下的媒介记录”，将“成为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②。由于中国媒体前所未有的及时、公开、深入报道，不仅成为救灾力量中的重要一员，而且为塑造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和公民形象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反观海地的灾难记录，由于海地本国的媒体在地震中几乎完全失去了

^① Alex von Tunzelmann, *Haiti: the land where children eat mud*, The Sunday Times, May 17,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6281614.ece.

^② 雷力：《灾难和它的媒介呈现——解读“5·12”地震灾难事件》，徐新建主编：《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85页。

运作能力，以及因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极度微弱，因此这次将谱写入海地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灾难记忆，无疑可以被称为“他者表述中的海地地震”。

延续和继承汶川地震中锻炼出来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之专业精神，中国媒体在海地地震发生第二天即奔赴“战场”，新华社记者成为踏上海地国土的第一位中国记者，^①与随后赶到的各路同行一起，在困难重重的异乡灾区搜寻与记录，感受与传播，铭刻关于灾难的记忆，也激发关于灾难的思考，更启示走出灾难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传媒而言，对他者进行记录与表述，将不可避免地带着中国自己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惯性，从而在他者的记忆里深深刻下中国烙印；另一方面，由于灾难新闻的特殊主题，使中国传媒在报道自我的灾难时，或多或少有一些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顾虑，而此次媒介事件中，中国传媒一方面借鉴汶川地震中的报道经验，同时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暂时跳出中国自身的媒介生态环境，以客位的眼光观察与记录灾难全景，全方位表述与解读灾难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冲突。

一、框架理论视角里塑造国家形象

在大众传媒研究中，框架理论（frame theory）是分析研究传媒生产机制与过程的重要理论。此概念来源于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 1995年），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信息或具有意义的行为，而高夫曼（Goffman, 1974年）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②，他在《框架分析》中指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指称事件和信息。”^③对于大众传媒研究，框架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行为，包含了选择和突显两个要素，即把认为有传播价值的元素挑选出来，在报道中从空间性、时间性以及话语叙述方式上予以特别处理。而选择和突显何种事实的动因，乃在于媒体记者置身其中的潜网——一种大范围的社会控制体系，

① 新华视频：《新华社记者讲述在海地的日子》，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01/29/content_12897559.htm。

②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0期。

③ E. Goffman: *Framing Analysis, An A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这种体系帮助记者按照现行主流话语来选择与传播,从而实现传媒所担负的社会引导与控制职能。

此次海地地震,恰逢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0周年纪念日,于是在此次中国传媒的海地地震报道中,一个最突出的议题是“中国行动”,全程关注和记录中国救援队的一言一行,突显着中国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能力。而八位中国驻海地维和人员的牺牲报道,成为中国人关注海地地震的焦点,从寻找、搜救到运送遗体回国并安葬的过程,一直贯穿在海地地震灾难的报道中。诚然,传媒如此高度、高调关注中国的维和行动与维和同胞的遇难事件,一方面是为表达对亲人的无限追思、敬意与纪念,另一方面,正如《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的,“随着中国日益积极扮演国际角色,他们的牺牲,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道义不得不承受的痛楚”^①。因此,在“国家形象塑造”这一框架视野下,中国传媒对海地灾难的记录与表述,成为继汶川地震后又一次提升与塑造中国形象的机会。

《时代》周刊记者奥斯汀·拉姆齐撰文比较了中国和海地地震后社会的异同:“回顾海地巨灾,让人不禁想到中国。然而地震的残忍和巨大的死亡人数可能是这两个同被地震袭击的国家仅有的相同点……地震一发生后我即去到中国,没有看到任何抢劫和违法事件发生,虽然山体滑坡和余震威胁不断,但并没有暴力危险……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确很强大,它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但是海地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海地,继续生存下去将是一种斗争……海地人民需要更多的国际干预和援助。”^② 将海地这样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与中国这样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许很多人认为没有意义,但是在巨灾发生后,两个国家表现出的巨大差距仍然令世界侧目,让世人感慨。相比中国汶川地震后政府救援的高效率与有效性,震后社会秩序的井然不乱以及国人迸发出的强烈凝聚力,在传媒表述中,我们看到海地地震后呈现出的完全是弱肉强食、悲惨绝望、乱象丛生的社会失序景况。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表述,汶川地震中,传媒反复播放着胡锦涛温家宝深入灾区与民众在一起的画面,通过突显与放大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人性关怀中的速度与力量,实现了“中国形象的嬗变”。而对海地总统的形象,《新民周刊》写道:“面对突来的天灾,流离失所的总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显得无助无

① 王婧:《八位维和警察的回家路》,《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月25日。

② Austin Ramzy, *Haiti and China: A Tale of Two Earthquakes*, Time, Tuesday, Jan. 19, 2010,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54644,00.html>。

措。”^①《中国新闻周刊》援引《华盛顿邮报》18日电称：“到现在为止，也不曾有灾民在灾区看到普雷瓦尔的身影，作为一个曾经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总统，普雷瓦尔在地震发生后通过卫星电视和其他国家民众见面的次数，远比和自己的子民见面的次数多很多。”^②

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在表达对海地灾难的同情之时，更感慨“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由此可知，传媒就在这种对事实的框限与突显中，实现与国家话语的互动与互构，同时为没有亲身经历的受众框定了有限的视野，使其认同与接受主流意识的影响与规训，由此建构国家形象并潜移默化地完成社会控制与社会凝聚的功能。

二、新闻专业主义下记录多元人性

一方面，传媒在特定框架下选择与突显着事实的碎片，另一方面，传媒也有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诉求，因而对事实（历史）的表述也体现着传媒的主动性与个性。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新闻工作者追求与恪守的职业理想和规范，其核心理念包括客观性、真实性、独立性等。中国灾难新闻报道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可谓路途曲折。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国媒体长期以来在灾难性报道中体现的主体都是救灾行为，突出执政党领导人，而灾难中的受害者及灾难性事件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与弱化，传达出的“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价值导向，从中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传承”。^③这种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精神在历代英雄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的神话叙事中得以确认，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各种灾难如唐山大地震、1998年抗洪以及数次矿难报道中得以贯彻与强化。

汶川地震的报道被称为可以载入中国传播史的媒介事件，其对灾难的记录突破了以往以救灾为主导的一元模式，开始将视角投入到灾难本身，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报道的核心是灾害；第二层是国内外的援助、受灾者的个体生命；第三层是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第四层是社会动员，以及核安全、环境污染等其他灾害的预防”^④。但是即便涵盖了如此丰富广泛的报道层次，与国外灾难报道比较来看，传媒在对灾难的反思深度与以及对受灾者面对灾难

① 邵乐韵：《海地生死劫》，《新民周刊》2010年第4期，总第575期。

② 王刚等：《海地，呼唤方舟》，《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1月25日。

③ 徐齐：《新闻图片中的神话与文化隐喻——中美媒体对矿难图片报道的解读性对比研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2909801000c01.html。

④ 程绮瑾整理：《“5·12”应是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时的精神层次解读上仍嫌不足。《南方周末》曾经在连续两期“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中，记录了一些现场人性弱点的表现以及对坍塌的学校建筑等进行质疑与反思，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一位署名为老土的人士撰文批评道，“南方周末似乎看不到这些，看不到一切光辉和伟大，在那似乎合乎西方新闻观的冷静、中性、原生态描述之中，流露出的是文章立意之怪，角度之异，心理之阴”^①。

如果说对国内灾难报道的反思与多元人性记录存在困难是基于传媒置身其中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媒介生态环境所限，那么在报道遥远他乡的灾难时，媒体是否会拥有更超脱的心态与客位的视角呢？通过检索各媒体的报道，我们发现中国媒体对海地受灾者的精神状态记录与表述呈现多元化之态势。在主流媒体采写的报道中既有宏扬坚强生存意志与乐观生活精神的《两女被埋七天后获救以歌感恩》《相信未来，希望不灭》《地震致身残，生存志犹坚》等篇章，也有反映灾民迷茫无助、冲突争抢的《海地大劫难》《记者连线：伤痛和饥饿中的海地灾民急盼援助》《海地青年吉尼奥尔和他的游戏机》《央视驻海地记者：穷人为生存制造惨案》等记录。以新华社记者记录的海地青年吉尼奥尔为例，地震后，吉尼奥尔父母兄妹皆亡，“现在他只剩下一部游戏机与他相伴”。当生活在巨灾面前完全失去目标与希望之时，吉尼奥尔说：“现在已经8点钟了，我还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我准备玩会儿游戏，挨到中午12点，看看有没有食品分发。如果再没有，就要继续玩游戏了。”^②像这些对于海地震后的社会冲突、人际冲突、道德失范与群体焦虑情绪的真实记录与追思，是传媒站在他者立场上的一种观察与表述，但体现了传媒越来越具有的专业素质与勇气，正如央视记者何岩柯在他博客里所认识到的：“海地地震后乱了，这种乱让人可以理解，但让人无法接受。很多犯罪的行为最终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地震带来的灾难，而灾难本身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考验。海地地震考验出的绝不仅仅是人性中的罪恶，那些在灾难救援中体现出的人情、关爱、互助、坚强、自我牺牲，更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才是人的本能。”^③

《周易正义·系辞下》里问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④可以说，人类的忧患意识自古有之，从天地自然之忧、

① 老土：《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检查日报》2009年5月30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5/30/content_8281042.htm。

② 新华社记者王宏达、王昭海地太子港报道：《海地青年吉尼奥尔和他的游戏机》，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0-02/03/content_12923886.htm。

③ 何岩柯博客：《海地札记——深入居民区》，2010年1月25日。<http://blog.cctv.com/html/59/811759-1108279-page-4.html>。

④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社会人伦之忧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个体情感与精神求索之忧，无不推动着生命的进化与文明的诞生。在人类进程中，灾难如影相随，现代传媒在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引领下，“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通过对灾难全方位的记录与多元人性的呈现，可以唤醒人类遥远而真切的苦难记忆，尤其在唯科学主义与唯物主义盛行的现代之路上，残酷而深刻的死亡记忆的现实呈现，将昭示着我们，死亡威胁依然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须臾不曾离开，人类只有学会尊重自然，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与情感，牢记生命记忆中潜伏的悲伤与无奈，才能在死亡的忧患意识中追求天地人的和谐运行，从而浪漫而不失理性地继续走向未来。

三、人文精神关怀中慎防“冷酷世界症候群”

随着灾难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传媒环境的日益宽松，有关灾难新闻伦理困境的讨论从未间断。新闻伦理包括有：对受灾者隐私权的保护，不为了抓取新闻点而干扰救灾现场，以及新闻图片和文字的健康式表达等方面。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于传媒的良好表现，使得这场灾难反倒成了“伟大而透明的国家成年礼”，但是受众对诸如记者在现场请救援人员“等一等，我先拍”的做法，以及在受灾者心头反复撒盐式提问等行为的指责也不绝于耳。要求传媒秉承新闻伦理道德，一方面是为了让传媒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更好地担当起社会瞭望者和公众利益守护者的角色，同时，也是为了让反复浸沐于传媒环境中的现代受众免于沦为“冷酷世界症候群”。

“冷酷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是传播学者葛伯纳在其文化指标研究中提出的传媒在塑造社会文化方面以及对社会影响效果的分析理论。他的分析主要以电视暴力为研究对象，发现长时间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人，会慢慢对暴力及暴力的受害人“脱敏”，即失去敏感和同情心。而且看惯了暴力，暴力需不断升级才觉得刺激，长此以往，这些人就变得自私、冷酷、缺乏同情心及爱心，这些都是冷酷世界症候群的症状。自然灾害虽然不能堪称暴力，但那些随时遭遇的山崩地裂、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惊心动魄的废墟里伸出的手、充满恐惧的扭曲了的表情，所有这些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通过传媒这个“身体的延伸物”，那么真实地撞击与触动人的神经，尤其对于刚刚经历了汶川地震的“媒介事件”的部分受众，面对海地这样一个遥远而陌生国家的灾难，难免会变得麻木与迟钝，不再能激起最初的那种震惊感受与痛切体验。

有鉴于此，中国传媒对海地的报道一方面大打“亲情牌”，大力报道中国维和警察的牺牲以及中国救援队的事迹，一方面又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以一

种理性的视角记录灾难残酷、人性冲突、社群失范等现状。如《新民周刊》的《海地生死劫》，重庆晚报的《海地 15 岁女孩地震中幸存捡装饰画却被当街击毙》，新华社的《海地 4500 名重犯地震后脱逃 武器库被暴徒洗劫》《海地：抢劫者被当街裸体鞭打处死》等报道，都以极富冲击力的标题与图片刺激着受众即将麻木的神经。媒体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这些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没有见过的阴冷人性与阴暗人生，对于一般受众来说亦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吸引着受众的关注与关怀。诚如有记者坦言：“说实话，人性都有弱点，也都会害怕，但在这一刻，责任战胜了软弱，感动唤起了勇气，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海地地震的关注并且能够伸出援助之手。”^①但是要唤起受众真正的关注与同情，仅靠刺激的标题与图像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西方的媒体记者做得比较优秀，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海地碎石中寻找父母是件容易活》(*Finding Parents in Haiti's Rubble Was Easy Part*)^②，记叙了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海地音乐人于地震六天后回到家，在楼房废墟里救出父母，然而真正的困难却在后面的逃难之路中的经历，报道细致精微地描述了一幅活生生的流民图，读后让人感慨万千。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对一位黑帮头目的专访 (*Damascène Maurice, gang leader who escaped in the Haiti quake, tells his story*)^③，则是记者不惧危险去到海地的魔鬼之城——太阳城近距离采访一个从监狱里逃跑出来的黑帮老大的故事，报道本身极具传奇性，但记者冷静地观察与进入到这位黑帮老大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在报道人物的一言一行中品味与思考所谓对与错、善与恶、爱与恨、民族与国家等并非能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简单定性与判断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在呈现灾难中人性阴暗面时，要本着“关爱式创伤报道”(Concerned trauma reporting)之原则^④，即以理性的视角，真实而专业地呈现所闻所见，不渲染，不夸大，更不恣意贴标签或进行污名化。这次海地地震报道中出现的显著问题，是如何定性灾民抢夺救灾物资的行为。《青年参考》上登载了美国作家、评论家丽贝卡·索尼特写的文章：“不少媒体在海地地震后，纷纷用‘抢劫’(loot)来描绘海地劫后余生的难民。这个语言定性遭到质疑：这个原本是形容战争期间士兵恶行的词，现在用在苦难的海

① 何岩柯博客：《海地札记 1 月 20 日》，<http://blog.cctv.com/html/59/811759-1104861.html>。

② Sarah Kramer, *Finding Parents in Haiti's Rubble Was Easy Part*, February 10, 2010, Th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0/02/11/world/americas/11rescue.html>。

③ Martin Fletcher, *Damascène Maurice, gang leader who escaped in the Haiti quake, tells his story*, The Times, January 27, 2010,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us_and_americas/article7003822.ece。

④ 李月莲：《采访四川灾难：关爱式创伤报道》，《四川地震香港记者反思录》，2008 年版。

灾难民身上，有专家认为那不是抢劫，而是活命本能。”丽贝卡提供了很多例子：“例如，海地地震后没几天，美国《洛杉矶时报》刊发了一组图片，配上带有‘抢劫’字眼的图片说明。一张趴在地上男子的照片配了这样的说明文字：‘一名海地警官将一个抢劫疑犯捆绑起来，该犯人拿着一袋奶粉。’而这名男子满脸是汗，冲着镜头，一脸哀求、痛苦之状。”^① 这样的警示中国媒体同样需要汲取，因为诸如抢劫、劫匪、不法分子等词语也充斥于中国的传媒中。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我们生活在传媒环境中，却不能意识到传媒的存在，就像鱼儿生活在水中，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水脏了鱼儿就会死，而传媒环境受污染了，人类还能健康生活吗？葛伯纳的“冷酷世界症候群”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结语：因为汶川，海地离我们并不遥远。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传媒首先承担着记录的功能，记录是为了更深地记忆，记忆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如果说在汶川地震中，“始终关注危机之中的人的生命，始终关注危机之中显现的高尚人格，始终呼唤善良、同情、理性、奉献这些人类文明的基本元素，是中国新闻媒体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呈现出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②。那么在海地的记录与表述里，中国传媒同样因为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公民形象的职责而框限和突显了“中国行动”的议程设置，在海地的历史记忆里深烙下中国人的影子。另一方面，对于他者的报道，因为不再需要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传媒的报道能在客位的立场上以理性的眼光审视灾难百味图，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状态加以深度关注和反思，因而在为我们传达远方苦难记忆的现实呈现之时，具有宝贵的启示作用。当然，在呈现个人的命运情感遭遇以及危机之后的社会冲突根源以及生成机制等问题时，媒体的记录仍嫌浮光掠影，缺少一种参与式观察的体验和在场感，因此诚如人类学家徐新建教授所言：“媒体呈现的是符号化的东西，我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要走出符号的世界，进入真实的世界。”^③ 从第三方角色看地震，媒体的记录是有漏洞的，要认识与弥补这些不足与漏洞，中国传媒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罗安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9级博士生，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① [美] 丽贝卡·索尼特：《不应称海地灾民是在“抢劫”》，转引自《青年参考》2010年2月5日，http://qnc.k.cyoul.com/content/2010-02/05/content_3079355.htm。

② 高钢：《四川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精神解读》，《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6期。

③ 徐百柯：《第三方视角》，徐新建主编：《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461页。